

审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

第一章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的采借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体质和文化的学科，经过上百年的演化发展，从古典进化论到新进化论；从文化传播学派到文化功能学派；从法国以杜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派到美国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到方兴未艾的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人类学展示出源远流长，与时俱进的强劲活力。人类学从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逐步演化成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思想情怀、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探视视角、一种学术资源，通过同相关学科的交叉，衍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审美人类学就是由于借鉴人类学理论方法实现优势互补而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众多新兴交叉学科之一。

人类学因为不同国家的学术传统以及不同流派的理论主张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而异彩纷呈的方法论，尽管每一种方法各有所长所短，包括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由于在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人调查同一个对象，却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由此引起“何谓真实”的质疑，但是，人类学一些相对稳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对其他学科提供一些启迪。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审美人类学而言，所有的新理论新方法，都可以成为借鉴的对象，而田野调查与实证精神、文化整体观与纵横坐标的确立、海外汉学人类学以及中国人类学方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一、田野调查与实证精神

尽管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体质及其文化的演化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和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构成人类的某个族群的体质特征和某个区域的文化形貌，提倡从个别出发，然后再上升到一般，久而久之，尤其在英美等国形成一种传统，要求人类学家必须选择一个调查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与记录，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一般性的知识。培养人类学的人才，也要求在学习期间，具备实地调查的经历，切实观察一年寒暑更替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类学家原习自然科学，后转攻人类学，将自然科学的求实精神，渗透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强化了言必有据，扎根于田野作业的务实态度。而实证哲学思潮的兴起，也为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地调查的求实精神，对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凌纯声、林惠祥、芮逸夫、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身体力行，不畏艰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后人开展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树立了典范，开创了中国人人类学以实证为基础的优良传统。他们的相关成果，如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费孝通、王同惠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以及林耀华的凉山调查等，备受国内外人类学家的推崇，至今仍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选择某个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族群，建立实地调查的基地，作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其长处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1. 可操作性——人类学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的体质和文化。但是，世界上 2000 多个民族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形态何其复杂，任何人类学家都无法穷尽。正如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时，由于人

类与动物王国里的直接祖先的历史关系十分混乱难解，只好转而研究甲虫的结构，以求得对生物进化过程的理解。人类学探讨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最经济的做法可能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完成。”^①“我们极需从那种对一个不太复杂的组织中所含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②

2. 可信程度高——科学研究忌讳主观臆测，凭着个人想象很难把握人类文化的精神实质，没有实证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经不起推敲，一击即垮。中国典籍浩繁，其中不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但其可信程度颇值得怀疑。台湾学者谢世忠先生认为：“这批史料全由非该族群的汉人所记，我们即使不去考量其中难以计数的偏见、臆测、夸张、无知、蒙混、欺骗和个人目的与利益的观点与内容，这一套材料下的族群历史，在我的看法下顶多只是‘一个在汉人想像世界中之某一被虚构族群的肤浅历史。’”^③此说法是否过甚？姑且不论，却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主要依靠的应是实地调查所得的可靠材料。

3. 富有穿透力——停留在表面的论述，往往是宽泛的、空洞的，一种理论的价值，体现在从个别到一般的升华，又能高屋建瓴地统率“个别”，渗透到社会的底层。要拥有这种强劲的力量，重要的还是从实证开始，把基点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中，以鲜活的材料，为抽象的理论增添蓬勃生机。

4. 学科的独特性——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之一在于它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探视角度和研究方法。由于方法论的不同，而得出与其他学科不尽一致的结论，这正是这门学科的价值所在。人类学不同于哲学、历史学、美学、文学的核心因

[美] R. 本尼迪克特著 王炜等译《文化模式》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57 页

② 同上。

③ 谢世忠、孙宝刚主编《人类学研究——庆祝芮逸夫教授九秩华诞论文集》，台北南天书局 1990 年版，第 408 页。

素，就是带着人类文化的整体观念去进行田野作业，从中汲取理论的源泉。抛弃了实地调查，人类学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

5. 国际的规范性——人类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国外虽然也有弗雷泽式的“书斋里的人类学家”，欧洲大陆的人类学（民族学）也长于思辨。但是，人类学的主流，仍是以实地调查为研究的基础，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性的研究手段和模式。

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中西人类学理论的对接与融会，都离不开扎实地开展实地调查。世纪之交的伟大时代，人类文化急剧变迁，但最具体、最生动的反映社会变化过程的材料，还是蕴藏在民间。深人民间，我们才具备同国外人类学相互交流的条件。中国文化研究同人类学有密切关联，但几度兴起的“中国文化热”，都缺乏一种实证精神，其结果多是仁智互见，莫衷一是，由热变冷之后，人们终于发现了某些奥妙，正如萧俊明先生所说：“不进行民族志研究和田野工作，研究者根本无法了解文化现实的构成与动作，更不用说去理解和解释了。”中国学人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基础，所以这种批判与重构往往只停留在纯学术的争执，深入不到具体的文化现实；由此而产生的文化研究，有骨架却不见血肉，有设想却是空中阁楼，有见解却无法付诸于实践。^①钱钟书先生曾把理论建构比做高楼大厦，把具体材料比做一砖一瓦，高楼大厦倒了，一砖一瓦还可以用。^②此说不无道理。人类学历史上的许多理论，如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精神分析理论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已被人们修正或弃而不用，但其代表人物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却依然闪烁着思想火花，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萧俊明：《从梦魇中觉醒》，《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② 钱钟书：《七缀集》，《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二、文化整体观与纵横坐标的确立

从文化存在的形态上看，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所有层面。实际上三者之间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叙说的方便，在研究当中，应注意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物态的文化同样凝聚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且更生动地体现了某个民族的智能水平、进化层次、宗教观念和心理意识。精神文化的创造也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则在物质——精神两种文化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代文明赓延不绝的国家，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举世无双的宝贵财富，也是值得从纵横交叉的角度加以多方位阐释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点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补性尤为明显，芮逸夫先生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笔者一向主张把田野工作的透视带到图书馆中，以便充分利用历史资料与民族志资料交互参稽，由人类学与历史学者彼此启发的认知潜能，探究各族的起源、播迁、繁衍、兴衰的因由，俾可阐明各族与历朝统治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与各种解决策略的得失，并可验证人类学上有关民族接触、文化涵化与社会变迁的理论。”

当然，人类学家对史料的运用，自当有别于历史学家的态度和方法，而应基于人类学的立场、观念、方法和目的，不可重复或取代历史学的研究，重点应是“在找寻一社会中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在追求行为的目的及意图。换言之，人类学家欲从重复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中，理出行为的通则；一来为为了解人类自

① 芮逸夫：《二十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民族史料汇编·序》，[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1年版，第 390页。

己的行为；二来为求对人类未来行为作预测。’^① 同样是纵向的、发展的理念，但贯穿始终的主线却因学科不同而相互区别。人类学所关注的更多是行为模式、思维特征、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等要素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人类学研究文化的发展历程，更多地表现为微观的研究。人类学家在观察某个村落的生活行程时，并不以为他们是在观察凝固的、静态的整个文化和社会，而敏锐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仅是某一特定时空演化过程中的某个具体时段上的文化，超越这个村落文化，还有更广泛、更深远的文化结构。人类学家认识文化过程的结构，既可采用“顺流法”（down-streaming），也可采用“上溯法”（up-streaming）。前者尽可能从最早的源头讲起，探讨民族文化由古迄今的变迁过程；后者以当今作为起点，追本溯源，找寻古今之间的内在联系。

建立了文化变迁的纵向坐标，鸟瞰由远古发源的文化演化过程，不难发现一个民族的生命潜能总的耗散路向，不难把握贯穿始终的潜在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精神的主旋律，孜孜以求的规律性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在其中了，是谓“观古今之变，通古今之事”。

有人主张，人类学研究的是“recent past”（刚刚过去的历史），把史前的研究、典籍的材料还给考古学和历史学。^② 从实地调查的角度看，根据族谱、地方志和老人的回忆，所能了解到的，多是数百年的历史，这应该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所在，研究具体的族群和村落，到此为止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上升到民族——中华民族层面，人们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

^① 唐美君：《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运用文献检讨》，收入《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民俗与文化组》，[台北 中央研究院 1981 年版，第 390 页。

^② 谢世忠：《芮氏民族史的性质及其方法论建构法则：兼论中国地区族群的历史过程研究》收入《人类学研究——庆祝芮逸夫教授九秩华诞论文集》。

“刚刚过去的历史”。

三、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巨大宝藏，急剧变迁的中国近现代社会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异彩纷呈的资料来源。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度。人类学家以探讨异民族文化，增进各民族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为己任，职业的特点使他们踏进中国人生活的社区，把中国纳入调查研究的视野，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民众生活的真情实景。始自 1918、1919 年葛学溥 (Daniel Harrison Kulp) 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民族志调查^①，经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对港台地区的调查，孔迈隆 (Myron Cohen) 对台湾客家

葛学溥根据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写成的《华南农村生活》。1918年，葛学溥在他的学生的帮助下，深入调查了广东东北部韩江流域归湖镇溪口村（学名凤凰村）的生态环境、族群关系、人口、民俗、政治组织、权力结构、文化教育、社会问题、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并将调查所得，与宁波、杭州的材料相比较，得出有关凤凰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质等领域的 71 个结论。认为韩江流域由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导致人民生活贫苦，人们依靠家族维持生计；出现了贫富分化。亲属关系与权力结构盘根错节；以家庭利益为核心，社会舆论影响力很大；婚姻不是个人的事，没有离婚之说。葛学溥开创了外国人类学家研究华南社会的先河。此书在国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必读书之一。

弗里德曼基于港台地区的调查写成的相关论著。弗氏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祖籍广东、福建，移居港台的居民，其突出贡献在于对汉人的宗族、世系、家庭、风水与祖先崇拜作了深入探讨。其中 lineage——宗族和世系是他研究的中心。认为宗族的变化过程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从单一至复杂，还有从复杂到单一的变迁过程。因为贫弱和疾病常常使某些世系消亡，所以，中国人很重视世系的延续。至于宗族衰落的原因，风水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都可以作出解释。世系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不一定成正比。婚姻和械斗是两个世系间的两种主要关系。传统社区中人的社会地位由学业功名成就和财富多寡决定。竞争与冲突存在于世系网络的各个层面。祖先崇拜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

人的调查^①，施坚雅（G.W.Skinner）对四川农村市镇区的调查，裴达礼（Hugh D.R.Baker）对香港上水地区的调查^③，杨庆堃 C.K. Yang 对广州鹭江村的调查、萧凤霞（Helen F.Siu）对

孔迈隆调查台湾美浓镇写成的《家庭分化与家庭联合》一书，着重研究中国台湾客家人家庭的发展过程和存在形态，提出大型家庭不是中国典型家庭的观点，认为简单家庭在各个社会阶层均可见到，大型家庭只存在于绅士阶层中。此外，他还探讨了家庭与财产、家居建筑、分家的原因、家庭与家族等问题。

② 施坚雅基于四川农村调查写成的《市场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施坚雅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标准市镇研究理论。主张以标准市镇为单位，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分析了集镇的形成过程、分布规律、小集市、标准市镇和中心市场的关系。探讨了集镇的结构及其功能、婚姻区与市镇的关系、权力与市场控制、中介机构和市镇的变迁。他的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和争议，波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裴达礼对香港新界上水地区的调查写成的《一个中国宗族村庄：上水》以及《中国家庭和亲属关系》。上水位于新界第二大平原——上水平原的中心，自然条件优越，廖姓从江西、福建迁至新界，后定居于此。作为典型的客家人，在当地占主导地位，到第七代获得功名，清初荣盛一时。裴达礼关注的焦点是宗族之间的关系、宗族与土地占有、宗族与婚姻。认为中国宗族的基础是亲属关系和仪式。实现村社的功能，离不开宗族，祠堂是开展宗族活动的重要场所，祖先崇拜观念支撑着宗族仪式及其实践。各支系间财产不平衡。宗族中的长者和有学问的人担当领导角色。细民地位很低，不是宗族的正式成员。不是所有富裕家庭是理想的，但几乎所有的理想家庭都是富裕的。他还对中西家庭的特点做了比较，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杨庆堃根据广州近郊调查写成的《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杨先生主要借助结构功能论的方法，对 1949 年前后广州鹭江村（学名南景村）社会转型过程作了对比分析，内容涉及人口结构、土地开发、生产消费、亲属制度、政府权力、阶级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土地改革、新政权的建立、乡村经济和娱乐的变迁。认为广东历史上是政治难民的流放地，与中央的整合并不紧密；曾经是革命的起源地，但革命发展到高潮后不再是中心。宗族文化发达，土改后生产力提高，但副业收入减少，信贷缺乏。《婚姻法》颁布，妇女地位改善。杨著是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建立前后社会转型历史的人类学著作，在西方人类学家赢得很高的声誉，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学术地位。

广东新会环城区的调查^①，到波特夫妇（Sulamith Heins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对广东东莞茶山镇的多次考察^②，构成了海外人类学家研究中国，尤其是中国华南的学术集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人类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国情，评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了解客位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海外汉学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上至 20 世纪初叶，下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转型阶段，东自港台，西至四川，他们分别投以热切关注的目光。由于他们各自的背景不同，所处的时空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体认模式和领悟深度不同，形成了相互区别的学术个性和品位，未能统合成风格统一、联系紧密、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人类学“中国研究学派”。但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学者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港台学者对汉人社区和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外国学者对非华人生活区，如东南亚、印第安人居留地的研究，他们又具有诸多相对一致性：都受过专门的系统的人类学训练；都用英文写作；都有西方

^① 萧凤霞对广东新会环城区调查写成的《华南的代理人和牺牲者：农村革命的协从》。萧女士作为有深厚中国背景的华裔人类学家，兼备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之长，而避大陆学者“身在此山中”和西方学者文化隔膜之短，所以，对中国社会实质不乏犀利洞见。她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广东新会环城区作了深入调查。该书的上溯至 1949 年以前，下延至 1979 年中国改革的兴起。由于 30 多年的隔绝，西方对中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缺乏了解，萧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和杨庆堃的著作相参照，可系统了解 20 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

波特夫妇调查广东东莞茶山镇写成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他们先期曾在香港调查。大陆对外开放后，波特携妻及家小进驻东莞市茶山镇增埗大队（管理区），真切体察当地的民众生活。该书不仅包含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对象，而且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情感文化建构、计划生育、中国农民与世界资本主义等新颖论题都作了深刻的人类学阐释。波特夫妇对施坚雅的标准市场理论、费孝通的民族工业与外来资本的关系理论都提出了相对立的看法。此书体验中国文化细密慎微，但方法论有些欠缺。波特夫妇的学术著作，与其他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论著一起，为海外人士了解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真实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生活和学术背景；都以汉人社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这种意义上呈现出共同的学术路向和方法论特征：

1. 继承传统学理，拓展异域研究新视野。传统的人类学着重探讨异民族文化，注重微观实地调查，客观描绘民众的生存境况，细致体验民众的心灵世界，总结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律则。上述的人类学家，除杨庆堃是在大陆期间，利用在广州任职之便，调查了广州近郊的鹭江村（现已成为市区）之外，其他诸位都是抱着对异域文化的浓厚兴趣，来到了台湾、香港、广东、四川，与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人类学研究传统模式相类似，大体上是沿用了共同的调研路数，把自己的立论依据，建立在亲自所见所闻的实证材料基础之上，以建立调查基地作为研究的突破口。这与当代西方人类学回归内心的价值取向是迥然有别的。20世纪初叶的葛学溥自不待言，20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大陆的萧凤霞、波特夫妇依然注重从客位文化视角，关注调查点的生态环境、社会历史、物质生产、社会制度、经济类型、日常生活、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深得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意旨。所不同的是传统的人类学家走向边远地区，研究原始部落，他们则走向了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把目光投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这种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同样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2. 强调微观实证，体察细致，以小见大。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严格遵守英美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建立调查点，强调细节描绘。他们都拥有自己特定的调查对象，如葛学溥之于凤凰村，杨庆堃之于南景村。他们观察之细致入微、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令人感佩不已。他们实是不择细流而成江海。弗里德曼研究婚姻区的分布情况，计算出婚姻圈的半径，大致为45英里，列表显示婚姻对象的分布范围。施坚雅计算出社区的平均距离为4.5公里，标准市镇区的距离为7.7公里，一个50岁的农民，到标准市镇共约三千次。萧凤霞的论著以细致见长，有关族产的占有情

况、供销社的经营额、农村干部的年龄比例，都有具体、生动的表述。翻阅外国人类学家研究中国的著作，可见地图多、表格多、坐标多、数据多、照片多。

3. 社会文化动态变迁，贯穿始终的主线。国外人类学家研究中国，是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各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流变过程，注重的是内在的社会转型机制。他们理解的文化，是处在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文化，动态演化过程中的文化。并不认为某个民族、某个区域具有恒常如一、经久不变的文化特质。与中国学者把中国社会文化上溯到先秦传说中的炎黄时代所不同的是，外国人类学家只探讨“recent past（刚刚过去的历史）”大多从调查对象族谱记载的源头谈起，而后着力论述 19~20 世纪之交和 1949 年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转变。只是各人实施动态变迁研究具体方略互有差异。弗里德曼注重的是宗族和世系的演化；施坚雅着重分析的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布雷克关注的中心在于族群和社区的变迁；萧凤霞重点揭示了新旧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波特则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从旧社会到改革开放各个层面的转化历程。反思中国“文化热”中，人们热衷概括亘古不变的中华文化精神、包罗一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战略，再审视外国人类学家具体的探析视角，是可以从中有所感悟的。

4. 婚姻家庭、宗教信仰，共同关注的焦点。外国人类学家研究中国，尽管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是认识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历史，但是探讨的核心问题仍是婚姻家庭和宗教信仰。家庭是人与人之间组合成的基本社会单元，组成家庭的过程涉及恋爱婚姻习俗、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网络，构成了房族和宗族，宗族之间矛盾冲突或通婚联合，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切入点。国外人类学家对此付出了大量的心力，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裴达礼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探讨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认为女子刚出生，就不是那么令人欢欣，没有广为人知的名字，结婚后被称为“××的母亲”。离婚几乎是

不可能，只有绝路一条，无处容身。死后也不能成为祖先。可谓洞察入微。波特夫妇研究婚姻家庭体现出独特的个性。认为“干活——劳动”是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也是衡量感情好坏的重要尺度，还细致描述了茶山人突破同姓不婚禁忌的过程、人们的择偶标准、婚姻的开支、户口登记。提出五种家庭循环的模式：（1）核心家庭；（2）父母和第一个儿子组成主干家庭；（3）父母和第二个儿子组成主干家庭；（4）父母和最小子组成家庭，或父母独立，所有儿子共同赡养；（5）父母去世，新的循环开始。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国外人类学家都共同意识到祖先崇拜在中国信仰习俗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葛学溥认为，在凤凰村，祭祀祖先不是个人祈祷行为，而是家庭行为。弗里德曼花大量笔墨论述风水与祖先崇拜的关系，认为祖宗是子孙后代与天、地、气的中介，祖宗和子孙相互记忆。裴达礼指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个人凭借其子孙而存在，父母和儿子间的相互负责是家庭运作的核心。

5. 关注民生，文化人类学家的情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任务、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类学家的独立性增加了，不再直接受雇于政府，不再作为幕僚为政府施政出谋划策以期有效地管理殖民地。人类学家自主地关注民生成为可能。作为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类学家，他们关注中国的生存状况，以平等的心境、宽和的精神去了解民众的衣食住行、谋生途径、人生旅程和婚姻家庭，领悟他们所思、所想、所苦、所乐、所哀、所愁，把目光投向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既不是受政府的指派，也不是为了商业利益，只是出于人类学家的抱负和情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探讨中国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葛学溥着重整体的描述；施坚雅以集镇演变作为突破口；萧凤霞是从权力链和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中国农民的处境；弗里德曼侧重在宗族网络中领会民众生活的情景；波特夫妇则更为细腻地体验民众喜怒哀乐的感情世

界，并从农民的意愿探析社会变迁的根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中国民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研究中国的海外人类学家，依托西方学术背景，思想开放，视野广阔；方法独特，洞察力强；旁观者清，见解独到。他们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为西方世界提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文本，功不可没。他们研究了许多中国学人忽视的文化现象，审视了许多看似不屑一顾的材料，赋之以人类学的研究价值，从中发掘出隐在的文化意蕴，体现出人类学家的可贵学识与胆略。他们也有某些误解，甚至偏见，但一般不属于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的欧美中心主义的民族歧视，而能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还不时体现了尊重异文化的博大胸襟。他们的学术路向和方法论特征对中西人类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弗里德曼的宗族世系理论反映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网络结构。施坚雅的市镇发展理论不仅对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对现阶段研究中国乡村都市化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萧凤霞深切理解和同情中国农民在“左”的错误干扰下无所适从的艰难处境。波特夫妇最为值得称道之处，是能够深刻理解 1949 年以后，中国内地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对那些西方人不理解、不断说三道四、指责中国的重大事件，波特都能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角度，阐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人类学家的道德良心，对相关事件做出中肯的评述，表现出正直的人类学家的优秀品德。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西方有些人士认为这是不尊重人权，波特夫妇在《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中辟专章，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实施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种种阻力，亦做出深入的论析。波特夫妇首先从农民的视角探讨计划生育，认为村民们最关心的是“将来谁来照顾我？”。村民们赋予养育小孩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可以干活，可以延续家庭血脉。另外，中国的法律规定了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在中央政府看来，实行计划生育，不仅是实际的需要，而且也是道德的需要。

波特夫妇指出：生育既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家庭注意的中心。必须从不同的视角审查，才能理解生育的意义和防止生育的意义。家庭主义的价值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冲突仍将继续，必须意识到养育小孩的价值体现在家庭主义中，而这正是削弱中国的内在原因。如果传统文化中异乎寻常的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思想得到克服，有一个小孩和作为一个小孩的意义得到改变，那么，在中国将创造出一种令人振奋的新文化和新的社会形态，这将成为小孩正当体面地出生、健康地成长、得到全面照顾的根源。如果中国人口失去控制，中国的下一代将与日俱增地承受痛苦，直到他们被自己的沉重人口量摧毁。西方攻击中国人权的另一借口是人工流产的增多，波特夫妇以大量的统计数据将中美两国妇女生育率和流产率相比较，雄辩地证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引产数量的剧增，但这个比例幅度仍然在美国的比例幅度之内。

国外人类学家研究既有中国学者鲜有的优长，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隔岸观火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西方学者重实证、重微观是其所长，但过分细致入微，导致材料淹没了论证，事无巨细的描绘使思辨的智慧变得暗淡。除了杨庆堃和萧凤霞能够较准确地选材，和谐地以观点统率材料外，其余诸位皆有宽泛罗列直叙，选材欠精之嫌。西方学者尽管主观上力求避免先入为主，但是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学术背景的制约，出现了一些文化误读。萧凤霞探寻代理人和牺牲者的内在关系及深层意蕴，固然不乏才识胆力，但若对照波特对中国旧社会和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巨变的深切体认，代理者和牺牲者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裴达礼和弗里德曼沉溺于中国的家庭、家族、世系、祖先崇拜学术性研究，专深有余宏博不足，未能创造性地建构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的理论。波特夫妇认为施坚雅的市镇区理论不适合用于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没有普遍性的意义，茶山镇不能构成施坚雅所理解的标准市镇区，并主张以村庄为单位研究中国

的社会基层结构。如果波特夫妇的这一反论，尚有可取之处，可成一家之言的话，那么，他们对费孝通先生认为外来资本破坏民族经济理论观点的反驳，则脱离了具体历史时空，难以令人信服。诚然，正像波特夫妇在茶山镇和增埗管理区所看到的那样，引进外资的结果，刺激了传统手工业，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并没有使农民失去土地而变得更为贫困，民族工业并未受到冲击而破产倒闭。但他们却忽视了费先生结论是基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事实基础，不能用 20 世纪 80 年代例证去衡量。如果现在费先生重新调查外来资本的民族经济关系，也不会得出当年那样的结论。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复杂，这既是人类学研究的天然宝库，也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不容易洞察中国社会的底蕴，因而做出任何结论，需要慎之又慎。为求接近事实真相，更须审慎适用适当的学术路向和研究方法。外国人类学家凭借他们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目前研究中国的丰硕成果，值得充分肯定。建构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体系，有赖中国人类学研究者共同协作，但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国外人类学界尤其是研究中国的海外人类学家提供参照坐标，而他们的不足之处，应当力求避免。

四、中国人类学方法模式的借鉴

中国人类学历来重视文化过程的研究和发展规律的总结，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

1. 费孝通—林耀华模式——这种模式是最具人类学的专业特色，以费先生的“五访江村”和林先生的“三上凉山”为范例，选择一个调查点，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再度前往调查，分析其前后文化差异，以原调查点引发出线性的规律性的认识。

2. 芮逸夫模式——选取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族群，通过考释